

从文学生产机制角度探析先锋小说的发生语境

赵白云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从文学生产机制角度探析先锋小说的发生语境,发现其独特性在于揭示出潜伏在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发生背后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力量和权力关系。

关键词:先锋小说;文学生产机制;语境

中图分类号:I2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4-0068-05

在人文风气浓郁的20世纪80年代文坛,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发生既是当时特定社会环境孕育的产物,又是中国文学自身要求变革和世界先进文学思潮影响共同激发的结果。为阐释和还原先锋小说在当时发生的特定社会空间和特殊文学语境,可以从文学生产机制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和分析。

文学生产机制,从语义上来说,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文学生产的机制;二是文学的生产机制,显然后者涵盖的范围广,前者被囊括在其内。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文学生产机制应该包括三种内涵。一是文学是一种生产,这就表明文学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密不可分;二是作为一种生产的文学,它在具体发生发展过程中离不开一定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机制;三是文学和维护其正常生产的社会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而各种社会机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某些政治权力,这就意味着文学和社会政治权力之间也会发生关联。

由此可见,从文学生产机制角度探析先锋小说这种文学现象的发生语境,与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相比较而言,其独特性在于它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力量和权力关系作为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将其仅仅视为文学发生发展的背景。

一、孕育文学繁荣发展的社会环境

依照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文学世界要形成一个场发挥作用,除了依靠作家的道德义愤(对经济利益、政治名誉的毅然决裂)外,主要依靠一个社会环境本身的必要性,这个社会环境的基本法则就是相对于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独立。这就表明文学场形成的关键在于文学自主性原则的确立。但布迪厄同时指出,文学场自主性的形成也离不开政治、经济的影响,也就是说文学自主性的最终确立需要一定的经济或政治体制作保障。^{[1]73-75}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的工作中心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得到空前解放。反僵化、反保守、追求创新成为这个时代的社会主潮,而作为社会思想中最有生机和活力的文学领域,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文学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人们一个时髦的日常生活话题,并在社会中逐步取得一种超越世俗权力的神圣地位。^①可见,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过“文革”的血雨腥风之后,终于开始了自己独立发展的新时代。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

收稿日期:2008-05-16

基金项目:黄山学院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生产机制分析”阶段性成果(2007xskq013)。

作者简介:赵白云(1979-),安徽巢湖人,黄山学院文学院教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创作理论及文化研究。

致《祝辞》时提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并重申1956年提出但一直并未真正实施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表明党对文艺方向问题的调整由此全面开始。同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就文艺的服务对象和思想方向由过去“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发表社论,重新确立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胡启立在1984年12月29日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在宣读的“祝词”中提出“创作自由”的口号:“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当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

国家政治精英分子以党的代言人身份对文艺政策和文艺方向所作的根本调整,使得文艺体制对文学发展的管辖和控制相对松懈;文艺体制中某些重要的文学组织也经常召开各种文艺理论座谈会,积极探讨与文学关系密切的相关问题。如1979年3月,全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组织召开了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4月,《上海文学》、《长江文艺》等刊物开展了关于文学“工具论”、“从属论”的争论,并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大讨论。可以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试图摆脱政治的长期压抑和控制,寻求自身独立性发展的真正开始。

毋庸置疑,党在文艺政策方面的调整不仅为文学的自由发展营造了宽松而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也给予文学自主性的获得提供了舆论和制度上的保障。由此不难发现当代文学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悖论:欲求摆脱作为政治附庸和工具的文学在寻求自身的独立和自主时,依旧离不开政治权力体制的扶持和保障。这也预示着孕育于其间以纯文学姿态出现的中国先锋小说,自诞生之初就潜伏着生存的危机。对此,有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意识形态调整带来的幻象。相比较而言,今日的社会条件无疑更加宽松、思想更加开放,而文学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却明显今不如

昔。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辉煌乃至先锋小说的发生发展不应仅仅归因于社会意识形态调整的结果,而是与当时文学自身革新的要求和西方先进文学思潮的影响密不可分。

二、中西交汇中的文学语境

创新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文艺作家、理论家追求的核心。就文学来说,这种创新的要求和心理反映在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一般都表现在形式或者语言方面,这明显与当时文学要求回到自身的观念有关。可以说,创作界、理论批评界对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形式探索和研究贯穿于整个80年代。随着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和文艺理论的大规模引进,这种艺术探索和创新也越来越趋于全面而深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的出现,即是中国当代小说在文体形式和语言实验方面探索、创新的极致。

1. 意识流小说:创作界探索小说形式的锋芒初试

当代文学创作界对文学艺术形式进行探索和创新以朦胧诗的出现为滥觞,在小说界则是从王蒙等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开始。1979年,王蒙在《当代》第3期发表中篇小说《布礼》后,连续创作了《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小说。这批小说大胆突破传统小说按时间和情节顺序结构故事的做法而代之以人物内心活动和意识流动来结构小说,侧重表现作品人物的心灵活动历程。这种根据人物的意识和内心活动轨迹对时空进行切割和重新组合的叙述方法,明显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现代叙述手法的借鉴和运用。同样的小说形式探索成果也体现在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宗璞《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小说中。其中宗璞的小说中还明显蕴涵着生活的荒诞意识,因此时常也被称作“超现实主义荒诞小说”。

以王蒙等为代表的这批意识流小说,尽管在创作艺术形式上因受西方现代派小说技巧的影响而在阅读上给读者造成某种新奇感和陌生化效果,但以表现人的内心意识流动为主题的内容仍然延续了当时“文学是人学”的创作观念。从《春之声》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蝴蝶》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不难看出,这种小说创新形式是比较符合主流话语意识形态的,因而获得官方文学奖的认可。这也无疑在昭示当代小说艺术形式

在革新之初就和内容处于彼此分离的状态,而由此在小说理论界引发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现代派文学论争更是将小说形式探索和创新逐步推向深入。

2. 现代派论争: 理论界探索小说文体形式的自觉

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最引人注目的景观莫过于创作界和理论界之间互动格局的形成,这以小说界表现最为明显。王蒙等作家在创作上积极实践小说形式革新的同时,也表达出理论探索的热情,这使得新问世的小说作品往往能够得到理论界的迅速回应。

早在1980年9月,《文艺报》即为倡导艺术贵在创新,新的生活内容要求艺术手法的革新主张,在第9期上发表王蒙、李陀、宗璞、张洁等作家关于“文学表现手法探索笔谈”。其中,多数作家都论及到“打破传统,吸收西方现代派文学手法”的问题。王蒙在其文章《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中强调对艺术探索多样化的关注,力主改变长期形成的单一化创作模式,注重培植一些不同审美范式的作品。而作为新时期文学形式的积极倡导者、探索者和实践者的李陀,则直接呐喊出“打破传统手法”的口号。在他看来,当时文艺各领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艺术形式方面,新的社会生活要求文学艺术家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并指出在文学变革的时期不要过多强调继承传统,而要大胆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手法和技巧,同时呼吁文学评论界应对某些当时出现借鉴西方现代文学表现手法的作品予以重视和研究。

1981年秋,花城出版社出版高行健所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较为全面地介绍西方各种现代小说在形式、语言上的变化特点。他主张积极引进西方现代小说技巧,认为艺术形式的探索不是追求形式主义,小说技术不等于小说艺术,这种小说观显然与中国传统小说创作手法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自出版之后在小说理论界引起一番轰动。李陀、冯骥才和刘心武三人还就此发表了《关于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通信》,这些通信内容曾发表在《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上。尽管三人在对小说艺术手法探索针对继承传统还是引进西方现代小说技巧方面观点有所差异,但这个通信无疑扩大了其影响。其中,赞成者认为是“一本填补空白的书”(王纪人:《一本填补空白的书》)。批评者则认为忽视了“中国小说的民族传统”(刘彦钊:《中国小说的民族传统不容忽视》)。这在促进当代小说艺术形式自觉发展的同时,还引发了一场

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论争。

《外国文学研究》季刊从1980年第4期至1982年第1期,举行了为期一年半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讨论”,发表了30多篇讨论文章。而直接引发现代派文学论争的事件则是该刊主编徐迟发表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尽管在“编者的话”中他声明此文不是这场讨论的总结,但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质疑和讨论。思想文化部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指示《文艺报》转载此文,从1982年第11期至1983年第9期进行了连续性的讨论,间歇性讨论一直延续到1984年第6期。这场延续时间相当长的论争,固然折射出当时文学界引进西方现代派文学及理论相当谨慎的现实,但它在客观上造成的效果却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大规模引进中国,作家、读者、刊物和出版商对此表现出巨大热情。

当时主要的文艺出版社几乎都出版了一批20世纪西方文学名著中译本,代表性的有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发行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其中,以1984年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共4卷8册,上海文艺出版社)在读者中影响最大。这套作品选集中译介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家卡夫卡、巴思、罗布-格里耶、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理论界也开始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和西方各种文艺理论,同时开始反思过去文学研究方法的单调划一,酝酿着理论与方法上的双重突破。

总体看来,创作界引导理论界不断更新,而理论界反过来又促成创作界进行更大创新的格局是20世纪80年代文坛的最大特色。正是在创作与理论的和谐酝酿、变奏下,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才会应运而生,并直接促动了先锋小说的发生。

3. 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 创作与理论和谐变奏的乐章

从小说形式探索的深度来看,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显然有甚于意识流小说,因而对先锋小说发生的影响更为直接。这里之所以将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放在一起进行论述,是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和先锋小说三者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时间是相差不多的,大概都是1985年左右。以至当时的评论界对现代派小说和先锋小说在概念及范围所指方面的界定还相当模糊,甚至经常混为一谈,将二者关系完全厘清还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事情。二是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一定程度上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两种社会、文化思

潮的折射和反映。其中,寻根小说是欲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来抵制当时小说创作一味模仿和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的不良倾向,而现代派小说则直接表现为向西方现代文学与哲学寻求价值依托,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可以更为清晰地厘清中国先锋小说发生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轨迹。三是这时恰逢中国文坛上少有的创作界和理论界和谐共谋的时期,应该说,这三者的出现乃至后来在当代小说史上地位的确立与当时理论评论界的努力是完全分不开的。

寻根小说思潮的萌动与1984年12月《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西湖》杂志联合主办的杭州会议的召开有关。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文学与当代性”,与会者韩少功、阿城、郑义、李陀、吴亮等人都是当时思想很活跃的青年作家及批评家。在讨论到有关文化的话题时,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当代文学创作应该尝试将本土文化与现代主义相结合,拉丁美洲小说就是现代主义和本土文化结合成功的范例。这次会议之后,理论界就陆续出现一系列倡导和阐释“文化寻根”主张的文章,^②并直接促发了寻根小说的迅速崛起。^③

严格来说,寻根小说在当时的兴起与思想界1983年因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引发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有一定关系。为此,有学者认为回避政治、远离政治现实,躲到传统和民间中去,是寻根小说缺乏历史深厚感的原因。^④但从艺术上来看,寻根小说摒弃经典的整体情节结构模式,不仅作品中的艺术线索呈现出多重和混乱的状态,而且还出现空缺和空白。可见,寻根小说在尝试突破“典型论”和“反映论”等传统文学创作观念时,已然从缓解“写什么”的焦虑转化为“怎么写”的探索,换言之,寻根小说文本创作本意在于内容表达上取得突破,而事实上却在艺术形式探索上前进了一大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寻根小说的出现正是促动先锋小说发生的最直接艺术动因。这从早期以马原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家如莫言、扎西达娃等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

相对于寻根小说作家,现代派作家是更年轻的一代。他们一般在大学里受西方观念影响较深,对传统文化的神圣和庄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背叛和亵渎,以游戏的态度对待人生,并开始打破那种“大写的人”的神话,强调和确立“小我”意识。这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为典型代表,但这两个重要文本的突出成就还是表现在艺术创新上。《你别无选择》基本采用的是多维而无序

的散点叙事,整篇小说既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也没有统领全局的故事情节,而以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和情绪变化为主。《无主题变奏》则完全背离传统叙事的写实手法和故事框架,通过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和情绪变化来描绘荒诞变形的艺术世界。但这两个文本终因模仿美国“黑色幽默小说”、法国新小说痕迹过重,而遭到某些批评家的严厉指责。^⑤尽管现代派小说在当时坚持的时间不长,很快被不久之后兴起的先锋小说所取代,但它在理论界引发的争论和话题却不少,并直接影响了先锋小说家的创作。

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的竞相展技,促使文学理论界开始反思和更新文学评论方法。1985年被人称为“方法论年”是有其特别意义的。尽管此前已有不少理论文章提出有关文学研究方法更新的问题,^⑥但在理论界真正形成文学批评方法论探讨自觉的却是于1985年3、4月间在厦门和扬州召开的两次文学评论方法的研讨会。^⑦接着刘再复发表的两篇文章《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和《论文学的主体性》又引发关于文学创作主体性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对当时文学创作的直接影响,是作家开始自觉而有意识地将创作视角由外部世界缩转向人的内在心灵,文学开始回到自身,原先作为文学核心内容的社会现实被艺术形式所取代。因而,从1986年10月始,理论界又展开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关于文学“向内转”问题的讨论。^⑧文学理论界的这些讨论无疑促进了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更新,使得批评界对当时新出现的文学作品能够迅速作出合理的阐释和评价,进而为创作界的文学形式探索能够向纵深方向拓展储备了良好的理论条件。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创作界和理论界和谐共生的格局正是催发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的土壤,同时也是滋生先锋小说的温床。

赵毅衡先生认为,定义先锋文学必须要考虑文学所处的文化环境,只有当主流社会价值已基本稳定,不再需要(所有的)文学艺术帮助全民教育时,先锋文学才会出现。^⑨可见中国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文化环境正是培育先锋小说茁壮成长的沃土,先锋小说在90年代随着社会全面转型而转型的事实也有效地证明了这点。

在孕育文学繁荣发展的社会环境和致力于艺术形式创新的文学语境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一批倾心于艺术形式探索 and 创新的年轻小说家(如马原、残雪等)、编辑家(如李陀、程永新等)和批评家(如吴亮、李劫等),正是在他们共同的努力和支持

下,先锋小说的生产机制才得以初步启动,并为先锋小说的最终生成提供了可能。

注释:

- ①可参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此书是查建英对一批在20世纪80年代文坛作出突出贡献的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学者所作的访谈录,他们是阿城、北岛、陈平原、崔健、李陀、刘索拉、田壮壮等人,尽管这些人涉及不同的文艺领域,但在他们的回忆话语中均蕴藏着对八十年代文学的追忆和眷恋之情。
- ②有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6期)、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6期)、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等篇,其中,韩少功的文章被认为是寻根小说的理论宣言。
- ③事实上,阿城早在1984年《上海文学》第7期上发表的《棋王》即是一篇成功的寻根小说,但当时评论界却不知如何评价,但自理论界发表过一系列有关文化寻根主张的文章后,创作界更是立即掀起一股寻根小说创作的浪潮,代表性的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李锐的“厚土系列”,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王安忆的《小鲍庄》等。
- ④吴义勤在其《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中认为,把一些观念性小说视为现代派小说实在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最大的误会。虽然他们小说中并不少见正统西方现代派作品所常有的那些空虚感、孤独感、失落感之类的主题,但显然这些体验并不是真诚的,甚至还远没有宗璞等的荒诞小说更令人可信。
- ⑤这些文章包括:1981年,王春元在《文学评论》第1期上发表《文学批评也要探索新略》;1983年,黄子平在《文学评论》第3期上发表《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1984年,杨匡汉在《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上发表《关于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问题》;1984年7月5日,陈辽在《文汇报》上发表《文学评论和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等。

- ⑥1985年3月17日至22日,由《上海文学》、《文学评论》、厦门大学等单位在厦门联合召开了文学评论方法讨论会,就国内过去文学评论的方法与理论等问题作了反思与总结,对文学评论方法的变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85年4月14日至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等单位在扬州联合召开的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上,更加明确与深入地探讨了如何拓展文学评论的理论视野与操作方法问题,在要求变革与创新文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对80年代以来国内批评界引进先进理论方法研究文学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如何进一步引进与运用信息论、系统论、心理学、接受美学等问题。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它引起了文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普遍关注与热衷,进而形成了文学研究界的“方法热”,新的方法、新的名词术语一时间层出不穷。
- ⑦1986年10月18日,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的论文,盛赞新时期文学出现向内转的创作趋势,认为这是新文学创世纪的开始。该文发表沉寂一段时间后,始有人表示质疑,周崇坡在1987年6月20日《文艺报》上发表《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一文,认为从整体上看,“向内转”文学以及“向内转”的论调对于社会主义文学都是有害的,“有可能使时代的主旋律在文学中减弱甚至消失的危险”。当然支持者也不少,如童庆炳在1987年7月4日《文艺报》上发表《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一文,从文学创作艺术规律的理论角度对周文进行反驳。讨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到了1988年下半年,渐渐平息下来。但停顿两年之后,1991年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又接连发表署名文章批评“向内转”,至此这场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问题的讨论延续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参考文献:

- [1](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2]吴炫.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3]赵毅衡.雨季的感觉[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曲晓红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Production Mechanism in the Avant-garde Novel Context

Zhao ziy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angshan University; Anhui Huangshan 245041)

Abstract: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Avant-garde novel of the phenomenon of literary novel in this context, its uniqueness lies in revealing hidden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Avant-garde Novel behind in the various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strength and power relations of the Avant-garde Novel influence and infiltration.

Key words: The Avant-garde Novel; Literary Production Mechanism; Context

从文学生产机制角度探析先锋小说的发生语境

作者: [赵白云](#), [Zhao ziyun](#)
作者单位: [黄山学院文学院, 安徽, 黄山, 245041](#)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9, 11(4)
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4条)

1. 皮埃尔·布迪厄, 刘晖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 2001
2. 吴炫 [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 2004
3. 赵毅街 [雨季的感觉](#) 1991
4. 查建英 [八十年代——访谈录](#) 2006
5. 郑万隆 [我的根](#) 1985(5)
6. 韩少功 [文学的“根”](#) 1985(6)
7. 李杭育 [理一理我们的根](#) 1985(6)
8. 阿城 [文化制约着人类](#) 1985
9. 郑义 [跨越文化断裂带](#) 1985
10. 吴义勤 [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 1997
11. 王春元 [文学批评也要探索新略](#) 1981(1)
12. 黄子平 [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 1983(3)
13. 杨匡汉 [关于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问题](#) 1984(2)
14. 陈辽 [文学评论和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1984

相似文献(0条)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0904017.aspx

下载时间: 2010年3月22日